

## ◆「中国文化とアジア世界の文化共生」研究会

●**周星**— 我叫周星，是爱知大学的教员，我和张琢老师都同属于一个研究小组，对张琢老师刚才关于文化研究会这四年来的研究活动的总结，我想做两点补充。我们文化研究会通过很多的学术活动，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从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到中国的民族的结构，再到中国的宗教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宽，而且参与这个研究会活动的专家们也都是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有从事社会史、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有从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所以经常在讨论的时候可以互相启发。我们并没有得出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非常明确的结论，应该说这个研究还正在进行中，有一个印象就是，或者说勉强算得上结论的就是中国文化实在是非常复杂，这个好象也不是什么结论，但如果要在这么多非常不同、非常宽泛的不同的专题中来进行总结的话，我觉得有两点要提出来，第一就是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最近，现在正在中国得到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意义。我们知道，海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经常会倾向于把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按兵不动看作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最要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能够深刻理解文化、文化问题和文化政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政治性含义的观察者来说，眼下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研究2003年以来或者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很多文件，还有很多动向，可以看到它的基本走向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反应，它瞄准的方向是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它也要求对现有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包括宣传文化单位，也就是说涉及意识形态的部分，而且它还要求这个改革的目标是对国民、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求，要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么来看的话，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极端之间，确实可能存在一个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改革和转型这样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对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顺利地展开，或者说未来即将可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文化体制改革或者包括一些社会生活管理体制的改革，可能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积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大家知道，在中国，我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这个政治体制比较僵硬，知识分子经常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很难直接对政治体制、当局的政治体制进行批评，那么他们就会绕着弯，这已经形成为一个传统，从“五四”以来，就绕着弯来批评“文化”，形成一个对文化进行革命的一个传统，当我们政治上不能坦率地讲话的时候，就绕着弯来说文化，这是一个“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革文化的命”的传统。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说现在这个传统正在发生一个变化，中国的文化政策正在、已经、而且还要即将继续发生一个巨大的、彻底的转变，具体说来，就是从把文化看作是革命的对象到最近把文化看作是国家的安身立命的根本，看作是国宝，看作是民族主义的依据，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巨大。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中国政府加入WTO，使得改革开放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而在文化领域，中国政府近些年来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通过从外面引进一些国际上公用的、公认的和海内外学术界学者们经常定义的文化概念，彻底改变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在这个意识形态体制下僵硬的文化理念，具体的说，现在中国政府它的这个文化政策里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来把文化理解、看作是精英的，比如说各种艺术家，文化部管的是各种艺术家；或者上层的，一定意义上是官方的；或者是艺术的、审美的，就是看起来很美的那些文化；或者是被文字记载的，中国是一个文字的国家，那么被文字记载的好象就被承认是文化；或者说是那种被考古学发掘出来，那些能被眼睛看得见的才是文化，这样一些文化理念现在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我觉得在台湾已经发生过了，大概在70年代、80年代，就是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社会的文化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它发展成还包括了民间草根的、民

众的、大众的、生活的、非文字的或者无形的，用日语称呼就是“无形文化财”，这个文化的理念彻底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应该是 I C C S 我们文化研究会今后继续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应该继续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我的补充就是这两点，谢谢大家。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フロアのほうから質問、ご意見のある方はお願いします。

●**質問者**— 我很同意周星教授的关于中国政府关于文化方面正在转型，特别是比较注重了大众的文化，那么确实是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就是近年来比较注重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问题，这个非常重视，这实际上和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战略考虑也许也有关系，以后这个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加强研究，而且我觉得这个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实际也牵涉到刚才讲的那个方法论的研究，因为我主要是研究史学的，对金观涛先生仰慕已久，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也很高兴。在史学方面金观涛先生在 80 年代用新的方法使得史学领域有很大的突破，所以现在在史学界在世界史学方面的一个潮流就是进行比较的研究，这样就是可以打破民族主义史学的界限，所以，当然在文化方面是民族主义的好还是打破民族主义的好这些问题也值得研究，这些比较文化怎么把它发展起来，这个也许也是以后值得考虑的，我就讲这些。

●**司会**— 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ほかにどなたか、ご質問、ご意見のある方、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賈**— 我是对外经贸大学的贾保华，本来是打算在刚才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发言。现在我想在文化上讲一点意见，因为经济和文化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最近这些年也做了些研究，这里只想讲一点。首先，就是刚才张琢老师那个报告很好，我也受到了很大启发。虽然他没讲完，我还是把中文报告都看了。我现在想补充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确实曾经对周围的亚洲国家和乃至世界产生了很多的、积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中国文化，那么很多亚洲邻国的经济进步、社会发展可能还要再晚一些才会出现。但是，我现在想讲的一点是：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注意到中国文化对周围文化的一种消极的影响？比如，“五四运动”的时候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对儒家学说全盘否定，并且把这种文化作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这种由当时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口号，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周围邻国、甚至对世界在看待孔子和儒家文化的态度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现在也没有肃清，甚至现在很多中国人也不好意思赞美孔子或儒家文化。我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简单地把孔子当成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偶像和愚弄人民的工具，而不知道孔子实际上是三个：一个是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北方地区的那个真实的孔子，一个是被汉代以后的统治阶级神圣化和偶像化了的孔子，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如尊敬父母、重视教育、勤劳节俭等）体现出来的儒家文化。由于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以为孔子只有一个，同时他们又没有力量去改变国内政治体制和国际经济体系，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都用于自我批判，甚至在很多场合是过分的自我批判。他们轻易地以为，只要把孔子颠覆了、儒家抛弃了，那么中国就可以走向现代化。虽然这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孔子是打不倒的。而且我觉得对亚洲来说，特别是对东亚的中日韩来说，如果把孔子打倒了，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和纽带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即使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建立一种共同的亚洲意识的基础似乎也就只有孔子；除了孔子，亚洲实在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可以得到一种共鸣。欧洲就不同，随便举出几个文学家、思想家，全欧洲都可以有共鸣，亚洲除了孔子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在探讨文化的时候应当注意对“五四”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无限上纲，也应当做一下自我反省，并且从这里探索出一种中国、韩国、日本能够共同接受的新的亚洲文化，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司会**—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もう、おひとかた。

●**李長莉**—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长莉。刚才张琢老师和周星教授谈的这个文化组的讨论，周星教授提出来的现在近几年我们出现的这种大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宽松和兴旺崛起，这确实是一个应该关注的问题。我是学习历史的，在历史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历来只是比较关注上层精英思想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但实际上在中国的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大众这个层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所起的变化对于政治的变革、对于知识精英思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所以由此我也感到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中国近些年的社会的变革、这种发展，现在我们所提出来的现代化的这种价值理念，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因为实际上我们从近代以来，知识精英我们所现在关注的他们的价值理念，比较多的是关注从西方怎么样引进的，我们怎么样学习的，在这上面建构的，实际上里面还应该有另外的线索，也就是说从中国本土，怎么样从中国本土的资源里来积淀、来把它上升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核心，比如说我们现在近年来所提出来的关于“和谐”这样的理念，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现在知识分子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挑战，所以由此也是和金观涛教授所提出来的这种方法论这样的问题，和这也有关系，我们怎么样尽量地从中国本身它的内在这种资源和它内在的对自己的问题的一些思考，从近代以来它的变革当中怎么样建构适合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念，走了什么弯路，有什么曲折，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建构适合于中国自己本身的这样一套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理路，这个我想应该是不是以后可以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谢谢！

●**司会**—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ただいま出されましたいろいろな意見に対するコメントを張琢さんのほうから、簡単にお願ひ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張琢**— 谢谢大家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我想对文化，无论是对未来的现代化的价值观的建构，还是对当前我们文化的发展，我想提出一个概念，不要再有“文化乌托邦”的幻想，任何文化都是一个过程，都具有二重性，我刚才发言没有讲这个辩证关系，中国的文化，今年是鲁迅逝世 70 周年，70 年以前他讲：我们的传统文化哺育了后人，也束缚了后人。这可能也是对我们周边的兄弟国家的影响，当然也是二重的。一方面比如说给它贡献了文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以这个文字为载体的文化的，当然我们在给西方的竞争中间，近代落后了，日本相对于中国船小好调头，先捷足先登现代化了，但是我们就整个来讲，如果说我们光讲到对东方的贡献，那么我们这个文化是不是也成为一种包袱？一种裹脚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呢？所以说我觉得要注重文化的二重性、时代性，它的再生我觉得既要考证、挖掘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的优秀的东西，文化的发展都是离不开它本土的、自身的——这不光是中国的，我是说的亚洲各国的这些文化创造——也要注意现在的最新的、活生生的创造，只能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谢谢！

●**司会**— はい。それでは最後のセッションの環境に移りたいと思います。環境から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資源研究所の宋献方先生をお願いします。

#### ◆「現代中国とアジア世界の人口生態環境問題」研究会

●**宋献方**— 我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资源研究所的宋献方，是榎根老师在筑波大学的最后的学生之一，跟随我的老师从 92 年已经一起研究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工作将近 15 年，也参加了爱知大学 COE-ICCS 环境组的活动将近 5 年，下面谈一些感想和体会。第一点我觉得环境组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环境组的成员组成从年龄上讲是老、中、青结合，老的专家 70、80 多岁，也有 50 多岁、40 多岁的、30 多岁，也有很年轻的学生，大家在一起针对环境的问题进行探讨，我觉